

引 言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作了这样一番评价：“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1949年10月1日的确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日子。如果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摧毁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的社会，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其深远意义决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就政治破坏性而言，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决不逊色；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位从事“现代化”研究工作的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他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也以一种类似的口吻这样评价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国人民1949年以来所走过的道路，为其他民族树立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榜样。在当今充满着民族主义义愤的世界上，寻求民族尊严的人士未尝不可以看看中国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人是如何摆脱外来屈辱而以大国自立于世的。面对着国内的分裂和乱局，急欲确立牢固行政控制的国家领导人们，可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在先前曾倍遭军阀主义肆虐而历届中央政府又屡屡挣扎无望的国家里，实现了复兴并大体上保持着秩序的。立志于获得高速率经济增长，特别又是在诱人的重工业部门获得高速率增长的经济管理的计划人员，也可以看看中国在国营部门大幅度增加投资并充分利用其劳力资源之后所达到的那种引人注目的持续高额年经济增长率（长期在 10% 以上）。对于被居高不下的城市化速率、连续不断的高生育率和对社会服务的失控需求搞得焦头烂额的社会计划人员来说，中国人以大规模的社会改组来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做法，亦同样不失为一个难得的楷模。对于那些牵动着当今世界上欠发达国家民心的最伤脑筋的挑战——除上述问题之外，还可随便举出军事安全、能源自给以及对摆排场和官员特权的限制等，中国人的处理办法，既是晚近的成功经验，又有其独到之处。中国今天仍然面临着非现代化社会的许多头痛问题，这与日俄不同，与第一批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更加不同。因而现在已经有人在议论，认为中国将可能成为当代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样板。特别对现代化后来者的大国来说是如此。”

以上两段话，虽然都是由不同的作者在十几年前分别写下的（其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刚刚开始不久，这不免对作者的视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今天看来，作者们对 1949 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认识，尤其是对其性质和意义的认识，大体上说仍然是恰当的。在我们称之为“当代”即 1949 年迄今的这段岁月里，中华民族历尽风风雨雨，中国社会几经重大变迁。50 年的坎坷历程，50 年的艰辛探索，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既付出

了高昂的代价，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既短暂又漫长的发展道路时，我们也许会围绕着它的成败得失而发生许多的争论。然而，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除了几亿中国人民自身的进退得失之外，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还具有许多更为深刻的含义。实际上，正如上述引文的作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由于这些独特的性质，使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这段坎坷历程有了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份不断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理解和诠释的宝贵精神财富。

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进行研究和探讨，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界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研究课题之一。像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罗兹曼、迈斯纳、帕金斯、鲍大可、汤森、沃马克、苏·佩柏、马·怀特、施拉姆、沃尔德、黄宗智等人的名字已为人们尤其是中国学者耳熟能详。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 1949 年以来的社会发展历程进行自我反思，也已经成为社会的紧迫需要和学者们的自觉行为。在这方面也产生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社会学界路风等人关于当代中国“单位制”的形成、特点与变化的研究，孙立平、李路路等人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雷洁琼、杨善华、沈崇麟等人关于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的研究，王思斌、王汉生等人关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变迁的研究，费孝通、马戎等人关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变迁的研究，王颖等人关于当代中国社团组织变迁的研究，陆学艺、李培林等人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研究等等。中外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系统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进行反思和分析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概略说来，一项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完整描述^① 全面分析在内容上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 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制度是使人们的社会行为与各种社会运行过程有序化、稳定化的基本因素。制度变迁是制约社会其他方面变迁的直接因素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这部分应该对 1949 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各项主要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教育制度、科技管理制度、文化与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内容与功能以及各项制度之间的配合与联结状况作一具体的描述和分析，揭示各项制度的变化态势、原因与后果等。

2. 当代中国人口及其基本社会构成的变迁。一定量人口的存在是一个社会存续的前提条件。人口既是一个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也是影响社会结构和运行状况的重要因素。众多的人口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人口状况的变化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变迁过程其他方面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一部分应该详述 1949 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内我国人口总量及其基本社会构成（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构成、行业构成、地区构成、教育水平构成等）的变化状况，并对变化的基本态势、原因、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3.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变迁。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社会成员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组织起来。组织化程度与组织形式的变化对于社会运行有着重要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曾经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这种高度组织化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个既需要加以解释、又可以用来解释当代中国许多其他社会现象的重要变量。本部分应该对 1949 年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化的状况、各种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各种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作一具体的描述和分析。

4. 当代中国的家庭变迁。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之一，它与各种正式社会组织一道，构成社会活动的基本场所。家庭变

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方面之一。由于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我国当代的家庭也具有许多新的特点；随着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变化，当代中国的家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这部分应该详细描述 1949 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制度、家庭功能等方面的变化情况，并对变化的特点与原因、后果作较具体的分析。

5. 当代中国的社区变迁。社区包括城市、集镇、农村等形式，它是人类生活的地域共同体。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群体（如家庭）总是依托于一定的社区来存在和发展的。社区变迁（如城市化）是现代社会的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本部分应该对 1949 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城市与农村社区的发展演变状况、城乡社区发展上的差别、城市化的道路、方式与特点等作一具体的描述和分析。

6.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状况的变化。前面几个部分是把当代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水平面来加以描述。社会分层则是社会的垂直结构，社会流动则体现了一个社会在结构上的弹性程度。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状况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本部分应该对 1949 年以来我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状况的变化态势、变动原因、后果与影响等作一具体的描述和分析。

7. 当代中国的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社会精神层面上的变化，它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的变化。其具体踪迹可以从社会的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社会心态等领域在内容取向、形式风格诸方面的变化中追寻出来。文化变迁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反映，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本部分应该以这种方式，对 1949 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变迁状况、原因、后果与问题作一具体的描述与分析。

8.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变迁。现代社会是一个与世界逐渐

一体化的社会。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等方面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而应该成为度量一个社会变迁状况的重要方面之一。对外开放是我国当代社会变迁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本部分应该对 1949 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对外关系的特点、变化状况以及社会后果作一具体描述与分析。

9. 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变化。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是影响我国社会运行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本部分应对 1949 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一具体的描述和分析。

10.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状况的变化。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社会过程都会产生或包含一定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对这些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加以理解是了解一个社会的重要步骤。随着社会的结构、制度、运行机制的变化，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的状况也会发生变化。这部分应对 1949 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所产生的主要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状况作一具体的描述，分析其特点、产生的原因、解决方式及效果等。

11.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效果的评价。以上描述的是当代我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本身，但这些变迁过程是否可取却仍然有待于分析和讨论。社会变迁虽然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组织变迁、制度变迁、文化变迁、运行机制变迁等各个方面，但这些变迁本身不是目的，社会变迁的评价也不能从这些变迁本身来进行。对社会变迁的评价只能根据这些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效果来进行。本部分应根据经济增长、健康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教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社会秩序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对我国当代社会变迁的效果进行评价和分析，揭示我国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分别对上述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叙述和分析将给我们提供一

幅幅详尽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侧视图，这正是当前许多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文章和著作所做的工作。通过这些侧视图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便可以得到一幅相对完整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宏伟画卷。然而，不难感觉到的是，仍然有一些带根本性的、为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所必须讨论的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些分别的叙述中难以涉及。例如，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意义是什么？等等。不解释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了解就依旧不免有失肤浅。因此，需要有一部导论性的著作，来对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一次比较深入的讨论。这就是本书作者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以上述这些分散性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对 1949 年以来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迁过程作一次相对系统地宏观描述和理论分析，以期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方面的既有研究成果作一次初步的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描述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宏观历史图景，建立起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理论框架，既为读者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也为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进行理论分析的一种新尝试，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在理论视角上的综合性。正如本文后面所指出的那样，国内外当前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许多研究文献，大体上都可以分别归诸于侧重“现代化”过程和侧重“社会主义化”过程这样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而这两种取向各自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本书则试图将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尝试为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野。读者将会发现，通过上述两种理论取向的有机结合，我

们将会有机会看到许多分别从它们各自出发而看不到的新现象，探讨许多分别以它们为视角而发现不了的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化”这两种社会历史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两种社会历史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对这个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之核心问题的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本书正文由五个部分所组成。在第一章中，我们首先对国内外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献中的上述两种不同理论取向进行了简要地描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的理论取向。第二、三、四章则遵照本书的理论取向，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分成三个大的阶段，从宏观上对它们分别进行描述和分析。这三章构成本书的主干部分。在最后的结语部分中，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和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回答，对引言部分作出了呼应，并从当前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出发，对如何恰当对待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普遍遭遇的两难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期望本书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所作的分析和探讨，能够成为作者和读者进行沟通与理解的一次新契机。

第一章 理解当代中国： 两种不同的理论视角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各种学术的或非学术的文献中，“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这两个名词往往总是被联接在一起加以使用，构成一个老少妇孺人皆能诵的复合性新名词或名词短语：“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名词短语似乎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向人们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或内容，即“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化”。然而，从国内外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文献中，以研究兴趣和理论观点上看，却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分辨出两种不同的取向，即把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理论观点分别投向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现代化”方面或“社会主义”方面这两种不同取向。这两种取向，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化”取向，另一种则可以称

之为“社会主义”取向。^①

第一节 取向一：“现代化”

以“现代化”为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学者们，倾向于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主要当做一个不断趋向于“现代化”的变动过程来加以理解。他们并不否认也不完全忽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方面，但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精力却主要集中在前一个方面。他们主要是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虽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主义”方面的内容进行一定的探讨，但这也是为“现代化”这个主题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现代化”这个方面。他们把自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主要读成为一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即一部“现代化”的历史，认为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只不过是这个漫长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因此，他们侧重于以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理论为指导，或者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西方国家或其他

首先需要加以申明的是，正如一切概念类型在外延与内涵上都不是对其所“指称”的现象完整无遗的描述和概括一样，“现代化”取向与“社会主义”取向这两个概念类型也不是对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之研究文献的完整无遗的描述和概括。认真的读者一定能够指出，有许多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文献是难以毫无争议地纳入这两个概念类型中去的。而且，即使下面被我们分别纳入上述两种取向之一的一些文献，其取向的纯粹性质或程度也是可以讨论的。但这对本文的论述并不会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使用上述两种取向的概念，只是想把它们作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来标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献中的两种大致倾向。这样两种大致倾向的存在，我想绝大部分读者都是能够同意的。

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或者将其与 1949 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相比较，着力探讨 1949 年以来中国进行“现代化”的特殊条件、动力、方式、过程、阶段和结果，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方面，只是作为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才被结合到他们的研究框架中去的。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是人们所熟知的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包括当代在内的近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这本书的作者明确地提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是福是祸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现存社会模式无一例外地遭到破坏，现代化总是成为一种目标”^①；现代化一经在世界上任何一地展开，其影响便无可避免地渗及全球各处，不管这种影响靠的是武力还是人心所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②。但“现代化”的具体过程和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却会有所不同。

“就人们从总体上认识现代化究竟是如何在全世界因地制宜这个问题而言，中国一直占有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③ 中国是一个拥有高度古代文明的国家，被人们看做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亦曾在中国达到过很高的水平”^④，并一直被认为“在同化域外异族及其观念方面”具有很高的变通性灵活性；中国自晚清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就已经开始了有意识的“现代化”过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 页。

② 同上书，第 6 页。

③ 同上书，第 1 页。

④ 同上书，第 22 页。

程；尤其是 1949 年以后，中国又选择了一条与欧美国家和前苏联都有所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发展历程却一直曲折不平，历经坎坷。行至今日，其“现代化”的程度相对来说仍然较低。这些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使人们相信“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进行分析大有文章可做”^①。该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弄清中国社会中哪些因素有助于走向现代化，哪些因素阻碍着现代化，并对现代化发生的速率和模式加以评估”^②。作者们希望，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③。他们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知识和教育五个方面，以比较研究的方式，对包括 1949 年以后在内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和探讨。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始至终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上述各个方面的因素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例如，晚清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环境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人对外部环境所做的反映是促进了还是延误了他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政治结构适合于现代化的需要吗？诸如 1949 年以后大搞群众运动一类的国家决策，对现代化又造成了何种影响？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条件与政策等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社会是否建立了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整合模式？职业朝着有利于现代化的方向发生分化了吗？居住模式和社会组织已经为促进现代化而充分有效地发展起来了吗？知识和教育方面的状况是促进了还是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等等。通过研究，他们对 1949 年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

同上书，第 3 页。

同上书，第 5 页。

同上书，第 5 页。

程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见前引文），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尚未迈出多大的步伐，对准现代化目标的各种政策皆是短命的，且常常被证明是难以付诸实施的”^①。共产党人“为中国确定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们的胜利是中国的转折点。借助现有社会的遗产，并在他们所采纳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一套基本上旨在获得经济增长、军事威力和科学优势以及其他目标的政策，我们和他们一样一致认为这些就是所谓的现代化”^②。几十年来，“中共领导人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总算带领着他们的国家进入了现代化的中级阶段”^③。“在某些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比较起来，今天已经接近站到了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前列”^④。

除此之外，艾森斯塔德的《传统、变革与现代性》等著作也是从“现代化”角度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变迁（包括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些代表性作品。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在国内，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书可看做是从“现代化”角度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作者从“现代化”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所做的探讨，则集中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两篇文章中。在前一篇文章中，针对国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向以“革命史”作为自己的中心和主题这种状况，作者明确地提出“现代化”是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视角。“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新进展就是在‘革命’的传统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范式”^⑤。“以

① 同上书，第 590 页。

② 同上书，第 590 页。

③ 同上书，第 603 页。

④ 同上书，第 670 页。

⑤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9 页。

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①。“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②。作者还提出，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19世纪后期中国现代化的原初模式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大潮的冲击与中国资本主义自发趋势相结合的产物。变革进行得不顺利。辛亥革命推倒了清王朝，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这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变。在本世纪上半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面临一次巨大的发展危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来自西方、日本、苏联的严重交叉影响，发展陷入深刻的困境。王朝体制解体后现代国家的重组过程进行得更不顺利。1949年革命带来中国发展模式的大转换，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实现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的方式，在头30年中一直处在不断探索与实验之中，并未真正解决，在探索中又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新问题。1979年以来，在国际国内出现巨大变化的形势下，进行了又一次独特的体制内模式转换，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才开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③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一文中，作者则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过程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描述和分析，指出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些特点及其经验教

同上书，第100页。

同上书，第102页。

同上书，第112~113页。

训。

在我国社会学界，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则更是早已成为一种主导性趋势。可以说，迄今为止国内绝大部分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社会学研究文献，例如孙立平在其早期著作《社会现代化》一书的各个章节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对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各个方面所作的一些分析，李路路等人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过程所做的研究，陆学艺、李培林等人在《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一书及相关文章中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特点所作的分析等，基本上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现代化”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框架的，都是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主要当做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来加以考察的。社会学界的这种情况，与社会学本身在内容上的特征有关。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拥有一套可用于现代化研究的相对来说更为系统、更为精致的理论与概念框架。自孔德、斯宾塞以来，经迪尔凯姆、滕尼斯、韦伯、帕森斯、斯梅尔塞、列维·艾森斯塔德等人的发展而形成的西方主流社会学，本质上就是一套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理论。从主流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变迁，也就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变迁，二者差不多是一回事。因此，“现代化”取向成为国内社会学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导性趋势，实为顺理成章之事。

第二节 取向二“社会主义”

与采取“现代化”视角的学者们不同，以“社会主义”为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学者们，则倾向于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主要当做一个围绕着“社会主义”化而展

开的一系列社会变动过程（“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巩固、调整和改革等）来加以理解。他们也不否认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化”方面的内容，但他们的兴趣和精力则主要集中在围绕着“社会主义”化而展开的那些方面。他们主要是围绕着“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巩固、调整和改革这个主题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虽然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化”方面的内容，但这也是为“社会主义”研究这个主题服务的，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说明“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和变化状况。他们的作品向我们显示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史，主要是一部“社会主义”体制的演变史。“现代化”过程只是作为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变化相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被包括在内的。

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可以作为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取向来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范本。在这本书的“前言”和“再版前言”中，作者都明确地宣称，“我并不想把这一段历史当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实例来研究，因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们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本书以下各章将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目标和标准全景式地研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做‘民族主义者’或是‘现代化者’，既不能公正地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无法建立一个评价其成败的高水平的判断标准”^①。在评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时，无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主义者还是批判‘文革十年’的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我都努力按照他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目标所持的观点，而不是通过大多数西方学者惯常喜

^① [美]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 页。

欢用的‘现代化’这个多少有些杂乱的棱镜来看待他们本人的言行^①。在这本书中，迈斯纳集中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变动的条件、过程和后果，他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导致 1949 年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特殊困难？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是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他也描述和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化”方面的一些内容，但主要是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来加以探讨的。

国外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取向来分析和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的研究文献在具体观点上也有一些差别。A. 沃尔德、J. 奥依、D. 斯达克、维克多·倪和 N. 哈尔本人都对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研究中的范式演变过程作过大体相同的描述。^② 按照他们的描述，西方学者对苏联、东欧和中国

同上书，第 3 页。

^② A.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Jaen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ed.),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D. L.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M. E. Sharpe Inc., 1993; 孙立平：《极权主义、现代化理论、新制度主义——社会主义研究中的范式演变》，《中国书评》（香港），1994 年 1 月，总第二期；孙立平：《从工厂透视社会——瓦尔德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中国书评》（香港），1995 年 1 月，总第三期。在恢复重建以来的国内社会学界，孙立平既是国外“现代化”研究的最早介绍者之一，也是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三个范式理论的最早介绍者之一。